

以公理爭強權

顧維鈞傳

金光耀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留着辮子的顧維鈞扶着自行車，一個
晚清少年對新事物新風尚的追求



1920 年，顧維鈞作為中國出席國際聯盟第一次大會的代表率團出席會議



巴黎和會前後的顧維鈞



巴黎和會期間，決定設立「國際聯盟委員會」，中國入選，由顧維鈞代表出席



北京政府時期穿外交禮服的顧維鈞



1932 年，顧維鈞與國聯調查團抵達大連。與他同走在前排的是英國人李頓爵士



1930 年代初，顧維鈞與黃蕙蘭在歐洲



任駐法公使期間的顧維鈞



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中、美、英三國的首席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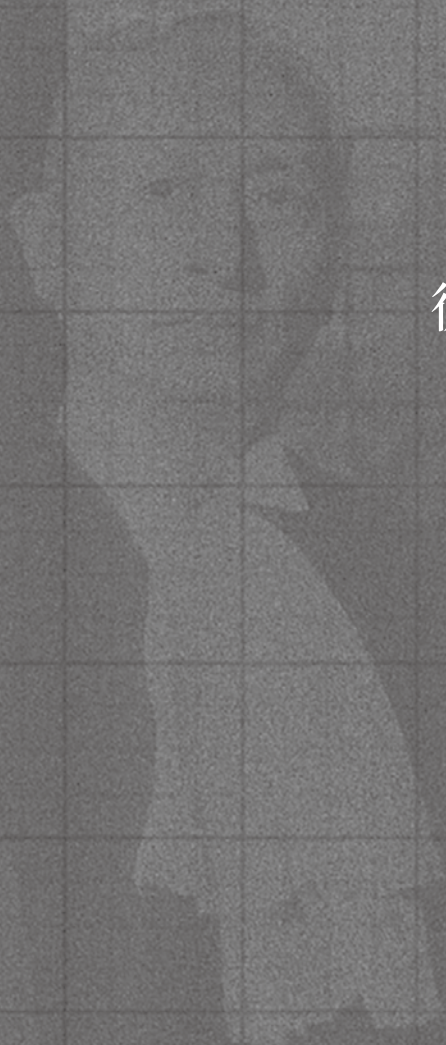
目 錄

第 一 章	從黃浦江畔到哈德遜河邊	001
一	租界裡長大的富家孩子	002
二	校園中的明星學生	012
三	留學生活動的先驅	021
四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030
第 二 章	外交界的年輕人	039
一	初入民國官場	040
二	「二十一條」交涉中的美國牌	049
三	華盛頓最年輕的公使	062
四	「遠交美以制近逼之日本」	073
五	未雨綢繆備和會	085
第 三 章	國際舞台上的中國聲音	093
一	巴黎雄辯威名揚	094
二	周旋於代表團內外	108
三	拒簽和約	119
四	華府會議再發聲	133
五	山東問題的結局	147

第 四 章	北洋外交的主角	157
一	出掌外交	158
二	解決中俄懸案	172
三	終止中比條約	186
四	申張主權	197
第 五 章	在派系政治的旋渦中	207
一	外交官登上國內政壇	208
二	內閣頻繁更替中的總長	215
三	依違於直奉之間的總理	230
四	「外交系」中的派系政治	238
第 六 章	國難當頭	247
一	張學良的外交高參	248
二	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	255
三	國聯調查團的中國顧問	269
四	密謀改善中蘇關係	280
第 七 章	抗日外交第一線	291
一	在國聯講壇上	292
二	駐節巴黎	305
三	為抗戰聲辯	318
四	爭取國際援華	330

第 八 章	戰時中英關係的推動者	347
一	不和諧的盟國關係	348
二	英國議會代表團訪華	364
三	新約交涉過險灘	370
四	籌劃宋氏兄妹訪英	382
第 九 章	參與創建聯合國	393
一	對戰後國際組織的期望	394
二	敦巴頓橡樹園會議	403
三	多黨多派的中國代表團	413
四	憲章簽字第一人	421
第 十 章	重返華盛頓	433
一	蔣介石委以重任	434
二	盡心竭力爭美援	443
三	台前幕後忙遊說	465
四	自由主義者的無奈	483
第十一章	「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馬」	497
一	「一國三公」、四面楚歌	498
二	朝鮮戰爭的衝擊	510
三	一波三折的「共同防禦條約」	520
四	心力交瘁別壇站	536

第十二章 人間重晚晴.....	545
一 國際法院法官	546
二 婚姻與家庭	551
三 月是故鄉明	562
四 民國外交的見證人	567
結語 「以公理爭強權」的外交家	575
主要徵引文獻	584
後記	593



第一章

從黃浦江畔到哈德遜河邊

一 租界裡長大的富家孩子

顧維鈞，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出生於上海。赴美留學及步入外交界後以英文名 V. K. Wellington Koo 而聞名於國際社會。

雖然出生在上海市區，顧維鈞對自己的祖籍嘉定縣（屬江蘇省，今為上海嘉定區）懷着濃濃的鄉情，一生以嘉定人自居。

顧家祖上從崑山遷來嘉定，至顧維鈞祖輩已成嘉定城中大戶人家。顧維鈞父親顧溶，字晴川，1856年出生，自幼「資稟明達，性行篤淳」。^①但顧溶剛懂事，家中就經歷了劇變。1860年，太平軍進佔嘉定城，此後三年，多次進出。兵荒馬亂中，顧溶的父親被太平軍抓獲，並被索要贖金，顧家傾其家產將人贖了回來。但因監禁中身心受到嚴重傷害，顧溶的父親回家不久就去世了。顧溶的母親鄒氏與嘉定城中許多人一樣，為避戰亂，拖着年幼的兒子並懷抱着更小的女兒，逃往上海的租界。^②

正如顧溶的墓誌銘所言，「嫠母瑩雛，資產如洗」，鄒氏拖兒帶女到上海後，只有依靠嘉定傳統的刺繡手藝養家糊口，拚命地做針線活，在暗淡的油燈下幹到深夜。大戶人家的傳統，使鄒氏在為生計奔忙時也不忘督促兒子學習，只是家境艱難，顧溶學習的重點不是傳統的詩書，而是「攻著作於計

① 《清榮祿大夫從一品封二品銜直隸候補道嘉定顧公墓誌銘》（以下稱《墓誌銘》）拓片，嘉定博物館藏。此墓誌銘為晚清官僚、同光派詩人樊增祥撰寫。

② 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說父親4歲離開嘉定，墓誌銘記顧溶「八歲而孤」。按墓誌銘寫虛歲，顧溶8歲即1863年。筆者傾向墓誌銘的說法。

然」，期望着學點本事可以早點謀生，「託生涯於貨殖」。^①

顧溶 14 歲時進入一家雜貨店當學徒。結婚成家後，他在岳父的報關行裡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家境開始好轉。但當顧溶 23 歲的妻子蔣福安剛懷上第四個孩子的時候，報關行因經濟衰退倒閉，顧溶一時失去了工作。蔣福安為此十分擔憂，她已經有了兩男一女，生活的重壓使她不願再添孩子增加家庭的負擔。她指望用某種民間偏方進行流產，但這一偏方並不見效。不久，顧溶有了更好的工作。因此，顧溶夫婦視腹中的第四個孩子給顧家帶來了好運。顧溶有了新工作後，搬進了小南門梭子弄的一幢大房子，第四個孩子顧維鈞就出生在新房子中。

顧溶的新工作並不是顧維鈞後來在回憶錄中說的在輪船招商局任事，這還要到幾年之後。這份新的工作是在朱葆三的慎裕洋行管賬，做總賬房。出生於浙江定海的朱葆三年幼喪父，14 歲時來到上海的五金店做學徒，靠着勤奮和聰明，逐漸被提拔為總賬房和經理。後來自立門戶，開辦了慎裕五金店，店址最初在老城廂的新開河，後來搬到了緊挨着外灘的福州路 13 號，名稱也改為慎裕洋行。隨着生意規模的擴大，朱葆三要聘一個人做總賬房，就找到了與自己年輕時經歷相似的顧溶。顧溶沒有辜負朱葆三的厚望，管賬後得到了「賬法精通，品行純正」的好評。^②

遇見朱葆三是顧溶人生的轉折點。地處公共租界中心區域的慎裕洋行是人來人往的重要社交場所。顧維鈞晚年仍然記得父親在福州路的辦公點是

① 《墓誌銘》。

② 寧波幫博物館編《朱葆三史料集》，寧波出版社，2016，第 41 頁。朱葆三長女的外孫女徐女士告訴何勇（原聯合國秘書處中文組組長），從小就從外婆（即朱葆三長女）那裡知道，顧溶是朱家的總管家。何勇的微信來信，2020 年 9 月 5 日。

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各種重要人物見面的地方。^① 慎裕洋行緊挨着外灘 9 號輪船招商局的北門。1892 年，顧溶得到盛宣懷的賞識，進輪船招商局，「年三十七，見器於武進盛公宣懷，不次擢之」。^② 顧溶的新職位是招商局新船「快利」輪的坐艙。「快利」輪是招商局專跑漢口—宜昌航線的，當時剛投入運營，排水量 870 噸，是航行於漢口—宜昌航線的四艘輪船中噸位最大的〔另三艘是招商局的「固陵」輪（304 噸）、太古洋行的「沙市」輪（811 噸）、怡和洋行的「昌和」輪（677 噸）〕。坐艙負責輪船的客貨業務，相當於乘務經理。顧溶與另一位坐艙林朝鈞隨「快利」輪首航抵達宜昌時，當地官商「以炮竹相迎」，「共放鞭炮二十餘萬響」，盛況空前。「快利」輪經營漢宜航線獲利很大，到 1900 年，除去各項開銷，「結餘二十四萬二千餘金」。^③ 但顧溶在「快利」輪幹得並不十分愉快。在 1895 年給鄭觀應的一封信中，他抱怨說，「所有在船賣票、收交客位水腳銀兩及進退司事一切等，均伊（張午峰）一人經理，溶稍稍詢問，即含糊答覆」。另有他人給盛宣懷的信稱，「張顧二人素不相能……同舟齟齬」。^④

1901 年，袁樹勳出任上海道台。朱葆三為維護與官府的關係，將顧溶推薦給袁樹勳，讓顧幫袁主理財政，「辟掌支應」。顧溶很快就得到袁樹勳的賞識，因理財成績顯著，不久就「晉三品銜」。上海道台要經手許多錢款，這些錢平時存放在哪個銀號或錢莊，袁樹勳並無定見，全聽朱葆三的，因此那些

① 顧維鈞：Topics for Memoirs，1958 年 6 月 26 日，手稿，徐景燦提供。

② 《墓誌銘》。

③ 《林朝鈞、顧溶致盛宣懷函》（1892 年 6 月），盛宣懷檔案，上海圖書館藏，檔號：105707。該檔案以下不再一一標明藏所。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輪船招商局——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 295 頁。

④ 《輪船招商局——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八》，第 603 頁。

銀號錢莊的經理都要到慎裕洋行來找朱葆三，以至於當時有「道台一顆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說法。顧溶在這之中自然起了重要作用。1908年袁樹勳升任山東巡撫，顧溶仍為袁做事，「辦外海拯濟」。^①顧溶手頭闊綽後，在家鄉嘉定置田2300畝，捐出來辦「承裕義莊」，為族中子弟辦學，並贍養族中貧困者。袁樹勳在1911年專為顧溶寫了《嘉定顧氏承裕義莊碑記》，可見兩人關係之密切。^②在為袁樹勳做事時，顧溶與盛宣懷的往來也沒有中斷。1909年，顧溶受盛宣懷委派任漢冶萍公司的查賬董事。1911年5月，顧溶再次受到盛宣懷重用，出任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總辦，並加二品銜，任直隸候補道。^③

從顧維鈞出生到長成少年的過程中，顧溶從一個「賬法精通」的賬房先生，逐漸成為一個與盛宣懷、袁樹勳這樣的晚清重臣有密切關係的官商。其中，朱葆三的作用是關鍵的。因此，不管顧溶到哪裡去任職，他與朱葆三的關係都沒有中斷過。1905年顧維鈞到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填寫的顧溶的聯繫地址還是慎裕洋行所在的福州路13號（租界的中心區域）。^④作為一個官商，顧溶不僅為顧維鈞提供了優越的生活條件，他在政商兩界周旋的豐富經歷也對少年顧維鈞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顧維鈞漫長一生的最初16年，就是上海租界內這樣一個富裕的官商家庭中成長起來的。

① 《墓誌銘》。高超群：《做生意與做人——清末民初商界巨子朱葆三的一生》，《銀行家》2003年第5期。

② 《嘉定顧氏承裕義莊碑記》，民國《嘉定縣續志》卷12《碑碣》。

③ 《漢冶萍公司致顧晴川、施亦爵函》（1909年6月22日）、《顧溶致盛宣懷函》（1911年5月），盛宣懷檔案，檔號：012521、022465。

④ 顧維鈞成績單（Koo's Academic Transcript），楊雪蘭提供。

與當時的富家子弟一樣，顧維鈞剛過了四歲就與他的二哥一起進私塾讀書。^①私塾在公共租界內蘇州河北的唐家弄，離蘇州河南的顧家約三里路。^②顧維鈞的啟蒙老師姓朱，是一個參加了十多次科舉考試卻都落榜的老童生。私塾的學費每年六塊銀元。二十多名學生中年齡大的有十五六歲，顧維鈞是年齡最小的。他從認字開始，後來讀經書、背詩歌。不管學甚麼，朱先生都要求大聲朗讀。顧維鈞在私塾讀了六年，根植下對中國文化的親近和熱愛，也打下了傳統學問的初步根底。以後他步入外交界，不僅以精通英語、擅長英語寫作和演講聞名，處理中文文書也得心應手，這是得益於私塾的訓練，也是他與有些留學生的不同之處。直到晚年，他還能隨口誦讀幾十首唐詩。^③

在私塾讀了六年後，顧溶認為顧維鈞應該有更好的老師，集中精力讀經書和八股文章，走傳統的科舉道路，重振顧家門風。此時的顧溶已在上海政商兩界結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位官員正好為自己的子女請了一位有名的學者做家庭教師，顧溶就將顧維鈞送到這位朋友的家中。這所家館的老師嚴厲而無情，整個氛圍與原先的私塾截然不同。顧維鈞一踏進去就不喜歡，雖然顧溶讓轎夫押着他去了幾天，但最後不得不順從顧維鈞的意願，允許他回到原來的私塾去。

1898 年，顧維鈞聽從姐夫蔣昌桂的建議，進入設在公共租界崑山路的中西書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預科學習。這是在沿海地區剛興起的新式學校中的一所，由基督教公理會開辦。與傳統的私塾不同，課程中有英文、

① 顧維鈞在回憶錄中說他 3 歲去上學，見《顧維鈞回憶錄》第 1 分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中華書局，1983，第 5 頁。但他在手書的 Topics for Memoirs 中寫的是 1892 年 2 月去上學。

② 顧維鈞與徐景燦的聊天錄音，1980–1985 年，紐約。

③ 顧維鈞與徐景燦的聊天錄音，1980–1985 年，紐約。

算術、地理等，教師中有剛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顧維鈞在中西書院住讀，每週一上午父親顧溶陪他一起從家中出發，到福州路 13 號後，父親去慎裕洋行上班，餘下的一半路程他由僕人送去，每週六坐黃包車回家。^①剛過十歲的顧維鈞在這所學校開始學英文，接觸西方文化，並顯示出在學習上的天賦。在同學中，他年齡最小，但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尤其在班級的英語拼字比賽中，總能拔得頭籌。入學一年後，在全校 350 名學生的各科考試中，顧維鈞的總成績是第八。而他卻不滿意這個成績，因為數學考卷中少寫了兩個數字，否則可以排名第一的。^②

1901 年 1 月，顧維鈞又一次聽從姐夫蔣昌桂的勸說，去考聖約翰書院。在等待考試成績時，他又去報考了南洋公學。發榜時，他被兩所學校都錄取了，而他最終選了聖約翰書院，3 月入學。^③

聖約翰書院是一所由美國基督教聖公會於 1879 年創辦的教會學校，教師主要由美國人擔任。1891 年正式成立大學部，為中國最早提供現代大學課程的學校。因此，有學者稱，「中國之有大學，自教會大學始。中國之有教會大學，則自聖約翰大學始」。^④

顧維鈞進聖約翰書院時剛過 13 歲，讀的是預科。雖然已辦了 20 多年，但書院招收的學生並不多。在顧維鈞入學的前一年，書院讀正科（即大學）的學生一共 43 人，讀預科的學生一共 125 人。因為學費昂貴，學生都來自富裕人家。預科學生中家庭出身為商人的有 80 人，學者的有 25 人，牧師的

① 顧維鈞：Topics for Memoirs。

② 《顧維鈞回憶錄》第 1 分冊，第 16 頁。

③ 聖約翰書院錄取名單見《申報》1901 年 1 月 26 日，第 4 版。

④ 熊月之、周武主編《聖約翰大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前言第 7 頁。

有 20 人。^① 規模不大的聖約翰書院是一所人才薈萃的學校，民國年間許多外交官如施肇基、嚴鶴齡、宋子文等都在這所學校學習過。而顧維鈞的老師中有剛從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畢業回國任教的顏惠慶，顧維鈞上過他的英文翻譯課。^② 顏惠慶後來與顧維鈞一樣，也擔任過民國政府的外交總長。在這所由美國教會創辦的學校裡，顧維鈞對美國有了最初的了解。

顧維鈞在中西書院和聖約翰書院讀書的少年時代，正是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和近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成之時。甲午戰爭的失敗、義和團事件後《辛丑條約》的簽訂，是晚清歷史上十分沉重的篇章。在租界中長大的顧維鈞，對外國人在中國享有的特權有切身的體驗和感受。在中西書院讀書時，有一個週六，他像往常一樣坐黃包車從學校回家。過外白渡橋上橋時，車夫拉得很慢，跟在後面的一輛馬車上的英國人急着要去跑馬場賭馬，嫌黃包車擋了他的道，就用馬鞭抽打黃包車夫。顧維鈞氣憤地回頭用英語斥責這個英國人：「你是紳士嗎」(Are you gentleman)？顧維鈞知道對英國人來說，這是很嚴厲的斥責。每次來往學校要經過外白渡橋南邊的外灘公園，他看見公園有不准華人進入的規定，認為英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氣焰太囂張。^③

到聖約翰書院讀書後，顧維鈞騎自行車到地處梵王渡的學校去。一次，騎自行車的顧維鈞為避開馬路上的車輛，在靜安寺路上跟着一個英國男孩騎上了人行道。英國警察放過了前面的男孩，卻將他扣下了。同樣騎車，卻面臨不同的處理，僅僅因為前者與警察一樣是英國人。這件事對少年顧維鈞有很大的刺激。晚年手書回憶錄提綱時，他將這件事和外白渡橋的事列為讀書期間不能忘記的兩件事，並在與記者談到外白渡橋那一幕時說，這讓我覺得

① 熊月之、周武主編《聖約翰大學史》，第 275 頁。

② 《顏惠慶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顧維鈞序，第 3 頁。

③ 台灣廣播公司記者阮次山採訪顧維鈞特別報道（錄音），1977 年 2 月 19 日。

一定要收回租界，廢除不平等條約。^①民族主義意識就這樣在他的心中生根發芽。

20世紀初，即使在上海的租界內，自行車也是一件奢侈品。顧維鈞有一張手扶自行車在照相館拍的照片。照片中的顧維鈞留着當時中國人都有的辮子，穿着長衫，左手夾着一頂中式禮帽，腳穿一雙布鞋。留辮子的少年手扶新潮的自行車，十分形象地反映了生在傳統社會的顧維鈞對新事物、新風尚的追求。另有一張照片，顧維鈞頭戴西式寬邊禮帽，身穿一套深色西服，上衣敞開着，白襯衫上映着花格領結，腳穿一雙白皮鞋，一副洋場少年的派頭。這幾張照片，都有「寶記 Pow Kee」的館銘。「寶記」是晚清民初公共租界內最有名的照相館，老闆叫歐陽石芝，是廣東新會人康有為的學生和同鄉。當時去「寶記」拍照是上海灘富商和文人的時尚。這顯示出租界生活對顧維鈞的另一層重要影響，即西方文化對一個十多歲少年的示範效應，以及由此導致的他對西方文化的嚮往和接受。在租界和教會學校的氛圍中，這種對西方文化的嚮往與民族主義意識同時進入顧維鈞的心中，交匯融合，形成一種能夠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義意識。這在顧維鈞年少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成為不會褪去的底色。

顧維鈞入聖約翰時，學校為順應社會潮流，聘請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中國教師。顧維鈞的中文教師就是一位剛從日本留學歸國的新派人物，贊同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派主張。十來歲的顧維鈞對社會變革和政治運動缺少深刻的理解，但像同時代大多數受到新思想影響的讀書人一樣，他已經開始嚮往變革。他在晚年回憶時說，「主要是由於新教師的思想的緣故，我和我的

① 台灣廣播公司記者阮次山採訪顧維鈞特別報道（錄音），1977年2月19日；顧維鈞：Topics for Memoirs。

同學越來越感到需要變革。但這裡所說的變革，並不是政府機構的變革，也不是重大政治制度的變革，因為我年歲太小，對這些還不能理解。我們只是感到有些事不對頭，需要新方法和新思想」，「模模糊糊地希望維新運動能夠成功」。^①

20 世紀初，正是近代中國留學運動蓬勃興起的時期。由於得風氣之先，聖約翰書院中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到國外去求學。這對嚮往西方文化的顧維鈞有着很大的影響。他的同班同學施炳元和施贊元也準備出國留學，並勸他同行。施家兄弟有一個叔叔叫施肇基，1887 年入聖約翰書院學習三年，後來赴美學習，獲得康奈爾大學的學位，此時已在晚清政府中任職，被期望出國留學的學生視為成功的榜樣。去國外接受正規西方教育的渴望，使顧維鈞決定與施家兄弟同行。

顧維鈞的母親極力反對，她不明白兒子為甚麼要遠渡重洋去異國他鄉學習。顧溶畢竟是一個見過世面的商人，並不反對兒子出洋，並允諾承擔兒子赴美留學的費用。雖然與顧溶相識多年的兩江總督端方提出要為顧維鈞提供官費，但被顧溶婉言謝絕了，他認為官費應給家庭經濟條件差的學生，而他自己能承擔這筆費用。^② 決定出國後，顧維鈞找裁縫做了幾套西服，這使他很興奮，因為這是屬於他自己的西服，以後照相不用再穿照相館提供的西服了。他還去理髮店剪掉了辮子，理髮師在動手前反覆問他是否真的要剪掉，最後收了他雙倍的價錢。臨行前，顧維鈞全家又去了「寶記」照相館，顧維鈞和兩位兄長一起與父親母親各合影一張。顧維鈞留着平頭，一身西裝，繫着領帶，而他的父親和兩位兄長的後腦都拖着辮子，穿着傳統的長衫。這正

① 《顧維鈞回憶錄》第 1 分冊，第 22、19 頁。

② 《顧維鈞回憶錄》第 1 分冊，第 23 頁。

是 20 世紀初急劇變化的中國社會在一個傳統家庭中的投影。年輕人嚮往變革，要去國外見世面，而年長的邁不開步子，還停留在傳統社會中。顧維鈞的母親在「寶記」合影時神色安詳，但到他離家的那一天，她哭喊着拉着他不讓走。^①

1904 年 9 月 8 日，顧維鈞還未從聖約翰書院畢業，就與幾個同學一起乘坐「蒙古」號 (Mongolia) 輪船離開上海赴美國留學。^②雖是自費留學，但他與湖北省的官費生同行，由聖約翰的前輩學長、擔任湖北留美學生監督的施肇基帶隊。

這裡有必要將顧維鈞與施肇基兩人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放在一起做一番考察。顧維鈞在上海租界內長大，而施肇基的家鄉在離上海不遠的吳江縣。上海在 19 世紀中葉開埠後取代廣州，迅速成為中外交往的中心城市，在這一華洋雜處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耳濡目染，不僅對對外交往不覺陌生，而且還有了解外部世界的願望。從家庭出身看，顧維鈞的父親是個官商，施肇基則出身於一個絲商家庭。兩人的家庭不僅生活富裕，而且父輩都因經商與外國人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對外面的世界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從所受教育看，他們在少年時就得風氣之先進入聖約翰書院接受西式教育，然後又都到美國留學。顧維鈞與施肇基的這些相同之處，也是 20 世紀上半葉大多數中國外交官的共同點。多年以後，顧維鈞與施肇基自然就成為中國外交界的同事。

① 顧維鈞與徐景燦的聊天錄音，1980—1985 年，紐約。

② Li Chen, "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 Vol. 4, No. 2, 2019, pp. 527–564.

二 校園中的明星學生

施肇基留學時在康奈爾大學學習，於是就將他帶的這批學生都安排在位於紐約州伊薩卡的康奈爾大學附近。顧維鈞與另一位中國學生孫嘉祿進了坐落在蒙圖爾瀑布村的庫克學院學習語言和預科。

1904 年 10 月，施肇基將顧維鈞和孫嘉祿帶到庫克學院，交給校長諾頓（A. H. Norton）。多年後，諾頓十分驕傲地談起這一天，因為施肇基和顧維鈞這兩位後來成為中國駐美國大使的中國人同時來到了他的學校。^① 諾頓見到顧維鈞問的第一句話是，「你為甚麼來美國學習？」顧維鈞的回答直截了當：「我來這裡要通過學習成為一名政治家。」^②

庫克學院是一所男女合校的農村寄宿學校，面向附近村莊的居民。一年的學費包括食宿是 900 美元，這在美國是很便宜了，但折算成中國通行的白銀約 1200 兩，足夠一個中等家庭十年的開銷。

諾頓非常熱情地接受了中國學生，但一些從未見過中國人的師生卻另有看法。有一名女教師見到中國學生入校，曾考慮辭職不幹，但在幾個月後，顧維鈞和孫嘉祿的刻苦學習和出色成績使她改變了想法，反而希望美國學生都能像中國學生一樣努力學習。有一些美國學生聯合起來，給校長諾頓發了一封最後通牒式的信，說如果學校不讓中國學生走，他們就離開學校。諾頓的回答是：「我很抱歉你們想離開，因為我希望你們願意留下；但我想，你們不得不收拾行李走人，因為那些中國孩子將留下。」最後那些美國學生不得

① Charles Hurd to Wellington Koo, June 22, 1977 (徐景燦提供)。Hurd 是美國西北大學化學系榮休教授，諾頓校長是其繼父，1902 年與 Hurd 的母親結婚。

② *Cook Academy Bulletin*, October, 1946，轉引自 Li Chen, “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 Vol. 4, No. 2, 2019。

不改變主意，沒有離校。其中一個叫帕克·布朗的學生多年後寫信給諾頓為此事道歉，並為顧維鈞這樣出色的同學而感到高興。^①由於整個學校，實際上也是整個村莊，只有顧維鈞他們兩個中國人，這為他們提供了學語言的良好環境，加上學習刻苦，他們的英語水平提高很快。顧維鈞和孫嘉祿都以一年的時間完成了原定兩年的預科學習任務。

預科畢業前夕，顧維鈞面臨着學甚麼專業和去哪所大學的選擇。與他同在庫克學院的孫嘉祿準備去康奈爾大學學工程，並極力勸說顧維鈞與他同去。孫嘉祿的理由是中國需要大批工程師建造鐵路和橋樑，而做工程師也是一個生活有保障的職業。但顧維鈞的志向是學政治學和外交學。顧維鈞之所以具有這一志向，是因為想為國家做些有益的事，而在上海這座近代中外交往最密切的城市所親身感受到的外國人根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所享受的種種特權，使他想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父親在這方面對他也有影響，顧溶希望他能夠進入政界。決定學外交和政治後，顧維鈞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還在聖約翰書院學習時，顧維鈞就仰慕哥倫比亞大學的名聲，知道這是一所著名的大學，它的國際政治學科十分有名；他還知道學政治學的嚴錦榮是第一個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在庫克學院學習期間，他翻閱過哥倫比亞大學的介紹，發現上面所列教授的名字有不少經常出現在報紙上，因此認定這就是他應該去的學校。^②

顧維鈞參加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考試，通過後被哥大錄取為新生。在口述回憶錄時，顧維鈞說，入學考試除了化學其他各科都及格，但他顯然記

① Charles Hurd to Wellington Koo, June 22, 1977.

② 《顧維鈞回憶錄》第1分冊，第27-28頁。《顧維鈞回憶錄》將第一位獲得哥大博士學位的中國人音譯為葉慶雲，應為嚴錦榮，見Li Chen, "Shattering the Glass Ceiling: The World's First Chinese Ph. D. Graduate," *The Law Teacher*, published online: 1 November, 2018。

錯了。根據成績單的記錄，入學考試並沒有考化學，沒有及格的是英語閱讀和歷史科目中的古代史兩門，通過的科目有英語、英國史、美國史、德語和包括代數、幾何、三角函數在內的數學。^①

1905 年 9 月，顧維鈞開始了在哥倫比亞大學這所常青藤名校的學習生活。20 世紀初，美國國內種族歧視還很盛行，排華風潮在各地尤其是西部屢見不鮮。相比之下，坐落在紐約哈德遜河邊的哥倫比亞大學卻以友善的態度歡迎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而不管其膚色和種族。紐約是一座國際化的移民城市，就城市氣質而言，中國的城市中上海與其最為接近，在租界中長大的顧維鈞對哥大和紐約的環境不會陌生。也正因為此，20 世紀上半葉有許多中國留學生來到這所著名的大學學習。入學半年多後，《紐約時報》報道了哥大學生群體的多樣性，顧維鈞與其他 3 位分別來自南非、伊朗和印度的學生被作為國際學生的代表報道。這篇文章稱他「只有 17 歲，但他的想法在許多方面比一些年長的美國同學還要開放和民主」。^②因為這種國際化的氛圍，顧維鈞一進哥大就有「回家」之感，從未感到有何不適。

哥倫比亞大學的本科教育水平很高，顧維鈞入學時雖然還沒有後來享有盛譽的核心課程，但他接受的就是典型的通識教育。第一學年的課程都是必修的，包括英語、歷史、物理、德語、哲學、化學、體育、數學、法語和生理學，這充分反映了哥大本科教育的特點。^③第一學年的英語課有兩門，其中一門是朗誦課，顧維鈞修讀了兩個學期，這門課為他參加演講和辯

① 《顧維鈞回憶錄》第 1 分冊，第 29 頁；顧維鈞成績單。

② *The New York Times*, 15 April, 1906，轉引自 Li Chen, “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 Vol. 4, No. 2, 2019。

③ 顧維鈞成績單。

論打下了很好的基礎。^①

雖然在聖約翰書院時接受的已經是美國式的英語教學，但進入哥大這樣的頂尖大學學習，顧維鈞開始還是不能完全適應。第一學期五門課程，一個 B，三個 C，一個 D。但他的學習能力很強，第二學期八門課，已經是一個 A，四個 B，三個 C 了。哥倫比亞大學有一規定，攻讀文學學士學位的學生必須修拉丁文甲班的課程，這一課程是以在中學學過四年拉丁文為基礎的。而顧維鈞從未學過拉丁文。為了能修這門課以獲得文學學士學位，他利用一年級升二年級時的暑假開始學拉丁文，結果用六週的時間學完了中學四年的課程，取得了修課的資格。一年後，他在拉丁文甲班的考試中得了 A。^②

第二學年開始，顧維鈞的課程除英語外，集中於歷史、政治和經濟，因為他希望以國際法和外交為主修目標。他選修了後來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比爾德（Charles Beard）教授的三門課：1832 年改革法案前的英國史、美國政黨和比較政治學。比爾德此時獲得博士學位不久，在哥倫比亞大學剛開始他的教學和研究生涯，日後他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主席。顧維鈞參加了比爾德組織的模擬美國政黨全國大會，學生按州分成不同的代表團，每個代表團提名自己的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顧維鈞被指定在模擬共和黨大會上發言，提名當時的眾議院議長坎農為總統候選人。這一經歷使他能夠更好地理解比爾德教授在課堂上講授的美國政黨制度。教顧維鈞歐洲大陸史的老師是肖特威爾（James Shotwell），他在巴黎和會時是美國代表團的顧問。^③

① Li Chen, "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 Vol. 4, No. 2, 2019.

② 顧維鈞成績單；《顧維鈞回憶錄》第 1 分冊，第 38—39 頁。

③ Li Chen, "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 Vol. 4, No. 2, 2019；《顧維鈞回憶錄》第 1 分冊，第 44 頁。

在三年級的時候顧維鈞修滿了大學本科四年所需的學分，1908年9月新學年開始時，他註冊為政治系的研究生，主修國際法。根據學校要求，需要要有兩個副科，顧維鈞最初選了羅馬法與比較法學、古代史，後來將後者改成了憲法。哥倫比亞大學在國際法和國際政治方面擁有一支一流的教師隊伍，為繼續深造的顧維鈞提供了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攻讀碩士學位時，講授憲法和行政法的教授是後來擔任過袁世凱顧問的古德諾（Frank Goodnow），顧維鈞對他的評價是「一位第一流的教師」，經常向他請教。^① 講授法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課程的都是當時具有國際聲望的著名教授。這個一流的師資陣容使顧維鈞獲得了以後作為一個優秀外交官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理論和學術素養，也使他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深受他的美國老師的影響。在哥大讀書期間，對顧維鈞影響最大的當然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穆爾（John Moore）。顧維鈞80多歲的時候，有人問他，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是誰？他回答說是穆爾教授。^② 穆爾是國際法權威，編有多卷本的國際法巨著《國際仲裁》，當時有不談穆爾就不用談國際法的說法，而且他還有豐富的外交經驗，擔任過美國國務院的助理國務卿，其間處理過與中國相關的事務，如美國傳教士對中國的權利主張和中國對美國排華法案的不滿。^③ 不過因為生病請假，1908年和1909年的兩個學年穆爾沒到學校來。顧維鈞的碩士學習是在頂替穆爾講授國際法的斯科特（George Scott）的指導下完成的。^④

① 《顧維鈞回憶錄》第1分冊，第34–35頁。

② Koo to Yorke, July 21, 1971.

③ Stephen G. Craft, “John Bassett Moore, Robert Lansing, and the Shantu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6, No. 2 (May 1997), pp. 231–249.

④ Li Chen, “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 Vol. 4, No. 2, 2019.

顧維鈞的碩士論文題目是《「卡爾德拉」號案件的歷史與法律》(*History and Law of the Case of Caldera*)。^①「卡爾德拉」號是一艘掛智利國旗的三桅帆船，1854年10月在九龍附近的一個海灣遭到海盜搶劫，中國地方當局獲悉後抓捕了海盜，並繳獲了部分貨物。船上的一些貨物屬於美國人，並在美國投了保。1858年底，美國投保人通過美國公使提出了損失貨物的索賠要求，儘管美國政府指定的負責調查美國商民損失的兩名委員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見，美國駐華公使還是支持了索賠要求，支付了5萬多美元。這筆錢來自1858年中美上海談判時商定的清政府給美國的賠款。顧維鈞研究的就是半個世紀前發生在中美兩國間的這件外交和法律案件。這篇約5000個單詞的碩士論文就像一篇法庭上的辯護詞。在仔細梳理事件過程的基礎上，顧維鈞引證國際法和中美間的條約，邏輯嚴密地論證道，「卡爾德拉」號案件完全是一起海盜事件，因此中國政府無須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美國沒有條約權力就發生在一艘智利船上的案件向中國提出任何要求；中國政府獲悉情況後立即逮捕並懲處了海盜，並繳獲了部分貨物，所以沒有任何責任。論文的結論是：中國政府不應支付損失貨物的賠款。^②這篇論文的選題表明顧維鈞對近代中外關係的重視，他學國際法的目的十分明確。整篇論文顯示了顧維鈞對國際法和其他法律文件的掌握和運用，也顯示出他在校園辯論和演講比賽中鍛煉出來的論辯能力。他後來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嚴謹、雄辯、注重法理的演講風格和處事能力在這篇碩士論文中已初露端倪。論文寫作期間穆爾還在病假中，但論文中引用了穆爾的《國際仲裁》，可見穆爾對顧維鈞的影響。

① 《顧維鈞回憶錄》的譯者因沒見到論文原文，將Caldera按詞的本來意思譯成了「破火山口」。該碩士論文見 *Jus Gentium*, Vol. 4, No. 2, 2019, pp. 655–666。

② Koo, “History and Law of the Case of Caldera”, 參見 Li Chen, “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 Vol. 4, No. 2, 2019。

1909年6月，顧維鈞獲得了文學碩士學位，當他與1905級同學一起高興地參加本科畢業典禮時，他比同學們多了一個碩士學位。顧維鈞此時已是哥大校園中的明星學生。他的名聲不僅在於作為一個外國學生，用同樣的時間多獲得了一個碩士學位，更在於他在專業學習之外，踴躍參加課外活動，顯示出過人的精力和才幹，在校園中引起廣泛的關注。

1905年11月，入學不久的顧維鈞就申請參加了新生辯論協會。1906年1月，該協會組織辯論賽，辯題是排華法案是否利於美國。顧維鈞與其他兩個美國同學組成隊伍作為正方，最終贏得了比賽。這是顧維鈞在哥倫比亞大學贏得的第一次辯論賽，是他成為辯論明星的開始。當時，同為常青藤名校的哥倫比亞、康奈爾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每年要舉行一次三校辯論賽。1908年，顧維鈞通過校內競爭獲得了代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三校辯論賽的資格，成為第一個參加這項傳統賽事的中國學生。因此，哥大代表隊一到比賽地康奈爾大學所在的伊薩卡，就引起當地報紙的關注，輿論對這位中國學生評頭論足道：「穿着得體，一身棕色的西裝配着棕色的格子真絲領帶，插着琥珀色的領帶夾。他的英語幾乎沒有外國口音。他的整個打扮與在美國通常看到的中國人甚至是中國的上層人物形成了明顯的對比。」^①這場辯論賽的辯題是國會是否應該要求所有從事跨州業務的公司持有聯邦許可證，哥倫比亞大學作為反方，顧維鈞擔任二辯。哥大最終戰勝了康奈爾。但伊薩卡當地的報紙對顧維鈞的兩位隊友的表現評價不高，一辯表現「緊張」，三辯「沒有做出所需要的有力的總結」，對顧維鈞卻不吝讚美之詞：「顧是哥大隊表現最好的人。顧對英語的掌握出奇的好，講得流利輕鬆。他表現優雅，雖並非總是充

① *Ithaca Daily News*, 28 February, 1908，轉引自 Li Chen, “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 Vol. 4, No. 2, 2019。

滿說服力。他的反駁十分得體。」^①

辯論隊獲勝不僅在哥大校園內贏得一片讚揚和歡呼，也吸引了紐約當地報紙的報道。銷量最大的《太陽報》採訪了凱旋的顧維鈞，刊出了半版的專訪。顧維鈞回答了為何如此執着於辯論賽以及辯論與自己今後職業生涯的關係：「一個人需要通過學習和寫作積累自己的詞彙量。如果一個人考慮以後投身公職，沒有甚麼比參加大學辯論賽所獲得的素質對他的幫助更大了。」細心的記者注意到顧維鈞在談自己的獲勝之道時，並沒有去貶低對手，因此這樣來描寫他：「他像一個老派的外交官。雖然他正準備在現在的學校繼續攻讀法學的研究生學位，但他承認——他很少的幾個承認中的一個，因為他並不總是直接回答——最終會進入外交界服務。」^②

顧維鈞還對當報紙編輯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哥倫比亞大學有一份學生自己編輯的校報《哥大旁觀者》(*Columbia Spectator*)。這是美國校園中歷史最悠久的校報之一，負責向全校師生報道學校的各種新聞，並登載師生所寫的評論文章，是哥大師生了解本校各種活動的主要渠道。二年級時，顧維鈞申請進《哥大旁觀者》做編輯，被編輯部選中錄用，從副編輯開始，一步步做起，到1908年4月被選為《哥大旁觀者》的總編輯，成為美國大學校報中首位擔任總編輯的中國人。一個月之前剛因辯論賽專訪過顧維鈞的紐約《太陽報》馬上報道了這一新聞，稱這個具有卓越才能的辯論者是哥大校園中最有人氣的學生之一。^③

① *Ithaca Daily News*, 29 February, 1908，轉引自 Li Chen, “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 Vol. 4, No. 2, 2019。

② *The Sun*, 15 March, 1908，轉引自 Li Chen, “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 Vol. 4, No. 2, 2019。

③ *The Sun*, 22 April, 1908，轉引自 Li Chen, “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 Vol. 4, No. 2, 2019。

擔任總編輯後，顧維鈞與編輯部的同學一起改進校報，特別是增加了對教師的報道。這一改進引起了大學校長巴特勒（Nicholas Butler）的關注，他專門給顧維鈞寫了封信，稱讚他和他的同學們的工作，並說整個校園都在讚賞校報新編輯部成立後出現的變化。顧維鈞後來回憶總編輯的工作時說，「這段經歷是很有益的。它確實大大有助於我提高寫作能力和密切與同學的關係」。^① 後來做外交官時，顧維鈞善於與媒體交往和周旋，與他在校園中辦報的經歷有關。

除辯論和編報外，顧維鈞還積極參加校園中其他很多活動。他通過競選成為由 7 名學生組成的學生代表委員會的一員，這個委員會是代表全體學生與學校行政當局打交道的。在這樣的競選中，他學會了與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打交道，以爭取盡可能多的選票。只要有人來向他拉票，他都同意，但要求對方也投票給他。顧維鈞還參加了戲劇社、語言社、法語協會、基督教協會、棋社、田徑協會、曲棍球協會、賽艇協會等許多社團的活動，並在二年級生節慶表演中登台演出。作為哥大的一名優秀學生，顧維鈞獲得機會參加了時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家宴，兩人就政治哲學進行了深入的交談，互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為日後顧維鈞出任中國駐美公使時與擔任總統的威爾遜建立密切的關係奠定了基礎。

顧維鈞以一個外國留學生參與這麼多的校園活動，並擔任了一些重要的工作，確實顯示了他的才幹和在校園中的影響。而這些課外活動也鍛煉了他的組織才幹和公關能力，這是一個外交官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哥倫比亞大學是常青藤名校，學生大多來自美國精英階層家庭。與這些學生一起學習和參加校園活動，是顧維鈞了解美國社會的主要渠道，他對美國的認識主要

^① *Columbia Spectator*, 10 October, 1908；《顧維鈞回憶錄》第 1 分冊，第 42–43 頁。

是通過精英階層獲得的。成為外交官後，他與美國政府、媒體等各界人士交往自如，與這段學習經歷密切相關。

哥倫比亞大學寬鬆的氛圍和顧維鈞自己的努力使他完全融入了美國的校園生活，因此哥大校長巴特勒稱讚顧維鈞是外國學生中善於適應新環境的典型。比爾德教授告訴紐約《太陽報》，顧維鈞是「這所大學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多年後，當顧維鈞的兒子進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時，校方還稱他是哥大歷史上最有才華的學生之一。^① 確實，在這所常青藤名校中，顧維鈞毫不遜色於美國本土最優秀的學生。

三 留學生活動的先驅

20 世紀初顧維鈞留學美國期間，正是中國留美學生人數快速增長的時期。顧維鈞到美國的前一年，中國留美學生才 50 人，到 1911 年已增長了十多倍，達到 650 人了。^② 而這一時期也正是近代中國變革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時期。日益覺醒的民族意識和強烈的愛國情感，使留美學生產生了結社的願望。在美國最早的中國留學生組織是舊金山、伯克利等地的留學生於 1902 年在舊金山成立的「留美中國學生會」，此後美國東海岸的中國學生也成立了留學生組織。^③

① 《顧維鈞回憶錄》第 1 分冊，第 37 頁；*The Sun*, 22 April, 1908；黃蕙蘭：《沒有不散的筵席——顧維鈞夫人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2018，第 110 頁。

② 王奇生：《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第 45 頁。

③ 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M. E. Sharpe, Inc., 2004, p. 171；葉維麗：《為中國尋找現代之路：中國留學生在美國（1900—1927）》，周子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 24、26 頁。

顧維鈞積極參與了中國留美學生的社團活動。1905 年他剛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擔任了紐約中國學生聯誼會的主席。那年冬天，清政府派出考察西方立憲政治的五大臣考察團來到紐約，顧維鈞代表紐約的中國學生歡迎考察團，陪同他們參觀哥倫比亞大學，考察團的隨員中有帶顧維鈞到美國來的施肇基。^①

美國東部的中國留學生組織是在 1905 年 8 月成立的，顧維鈞成為東部學生會成立後創辦的會刊《中國留美學生通訊》(*Chinese Students' Bulletin*)的主編。1906 年 8 月，東部學生會在麻省的阿默斯特舉行第二屆年會，顧維鈞擔任年會的議程委員會主席，參與了年會的組織工作。從這次年會一直到留學結束回國，除了 1908 年的年會，顧維鈞參與了東部學生會每屆年會的組織工作，擔任了東部學生會的一些職務，幫助處理了許多事務。1906—1907 年，除繼續負責《中國留美學生通訊》的編輯工作外，他還擔任東部學生會的英文秘書。1907 年 8 月，在麻省的安多弗舉行的第三屆年會上，顧維鈞以英文秘書的身份做工作報告。這次年會後，《中國留美學生通訊》改名為《中國留美學生月刊》(*Chinese Students' Monthly*)，顧維鈞擔任主編。《中國留美學生通訊》篇幅有限，改成《中國留美學生月刊》後內容大為擴展，成為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影響很大的刊物。後來，他還主持過東部學生會章程的修改。1910 年 8 月的第六屆年會上，顧維鈞當選為東部學生會主席，並最終於 1911 年促成了美國東部、中西部、西部的中國學生會合併成統一的中國留美學生會。^② 1910—1911 年，在擔任東部學生會主席，並作為《中國留美學生月刊》顧問期間，顧維鈞處理了 900 多封信，可見他對學生會工作之投入。

① 《顧維鈞回憶錄》第 1 分冊，第 31 頁。

② 李永勝：《顧維鈞與中國留美學生會》，《史學集刊》2020 年第 3 期。